

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和中蘇關係

• 戴超武

1958年8月23日，中國在事先沒有知會蘇聯的情況下，開始炮擊金門、馬祖，被稱為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國內學界利用中美兩國新近解密的檔案文獻，從中美關係的角度對這次危機的起源、進程，以及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作了相當系統的論述和研究。近年來，隨着蘇聯外交檔案文獻解密以及中國相關文獻、回憶錄陸續出版，國內外學者開始從更為廣闊的視野，特別是50年代中國外交戰略變化和中蘇關係演變來研究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實際上，研究中蘇關係演變與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新鮮的課題；早在二十世紀60年代初期，西方學界就試圖從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中尋找導致中蘇分裂的因素。冷戰結束後出現的新的檔案文獻，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從中蘇關係演變的角度，較為系統地研究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俄羅斯學者認為，1958年台灣海峽危機是對克里姆林宮的挑戰，同時也是向蘇聯在「全球馬克思主義帝國中領導地位」的挑戰；因此，「作為早期冷戰史中絕對的兩極體系瓦解的表現形式，1958年的台灣海峽危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①。而官修的中國外交史則強調，1957-59年中蘇兩國在外交領域存在着許多共同利益，相互進行了必要的支持和良好的配合，當中包括炮擊金門時蘇聯對中國的支持^②。如何看待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則需要系統探討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對國際問題的新看法和外交戰略的重大變化，而炮擊金門是中國領導人對這些新看法和新戰略的一次檢驗。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新看法和外交戰略的變化都與蘇聯的政策方針有着根本的戰略分歧；因此，炮擊金門的決策同蘇聯有着密切關係，不可避免地對中蘇關係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一 中國外交戰略的重大變化

毛澤東講過，(以下)這些國際問題多年來一直在腦子裏轉來轉去，逐漸形成一些看法、觀點，思想就開朗了。這些重要觀點和思想主要包括中間地帶理論、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東風壓倒西風」的論點、辯證對待國際緊張局勢等，而炮擊金門無疑是毛澤東對自己這些觀點和思想的具體實踐。

中間地帶理論是毛澤東在1946年同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的。1958年毛澤東指出，中間地帶上的一些國家，「既不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毛澤東明確指出中間地帶是牽制乃至消滅帝國主義力量的戰略區域，這一論點後來發展成為著名的「綏索政策」。

中間地帶的思想是50年代後期毛澤東反覆思考的一個重要國際問題，其觀點較之以前有根本的變化，也成為毛澤東觀察這一時期國際問題和確定中國外交方針的基本出發點。中間地帶理論是毛澤東在1946年同美國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談話中提出的。毛澤東當時認為，中間地帶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前途無非兩種：不是倒向資本主義的一方，便是倒向社會主義的一方。同時，因為斯大林時期蘇共不贊成中間地帶理論，而強調陣營理論，毛澤東在1947-54年間暫不提此論。但是，50年代國際局勢變化，使得毛澤東開始重新認識中間地帶的性質、作用，以及爭取「第三種力量」的重要性，因為相當數量的民族主義國家在擺脫殖民統治之後，繼續保持其中間立場，表現出獨立的政治要求，成為兩大陣營之間的中間力量，顯示出民族主義國家在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同社會主義陣營有着一致的利益。正是國際局勢的變化和這些國際重大事件引起毛澤東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政治性質、地位和發展前途等問題進行新思考。

首先，毛澤東認為美國控制中間地帶不僅是為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是為了削弱中間地帶上的國家。1954年毛澤東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指出：「美國的目標是佔領處在這個廣大中間地帶的國家，欺負它們，控制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最好使這些國家都弱下去，這包括日本、德國在內。」以後毛澤東反覆強調這個論點。他在1958年9月8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更是明確指出：「現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國都想霸住……它是霸中間地帶為主。」^③

其次，毛澤東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性質作了新的判斷和分析，從而改變了他以前的看法。毛澤東在1958年9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中間地帶上的一些國家，「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民族主義國家。拉丁美洲有許多這樣的國家，將來還會多……這些國家既不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參加雙方的集團，這是適合於它們現在的情況的」。而「第三種立場可以維持相當的時期，維持到還有必要的時候」。對於這種中立政策，毛澤東認為是「一種獨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場」，中國歡迎這種立場，因為它有利於和平事業，不利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在後來的一些談話中，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國家爭奪的主要場所是在亞洲和非洲，他提出：「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這三個主義中，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比較接近。」^④

第三，毛澤東明確指出中間地帶是牽制乃至消滅帝國主義力量的戰略區域，這一論點後來發展成為著名的「綏索政策」。毛澤東1955年4月29日同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Harry Pollitt)談話時指出，目前美國在廣大的中間地帶，從東京到倫敦建立軍事基地，把三百萬軍隊中的一百多萬都釘在這些基地上，動彈不得。這不像是個打仗的架式。「如果真的打起來，首先中間地帶就完了。但是這廣大中間地帶的人民中，亞非兩大陸就有十四個億，還有歐洲的人民，都是我們反對美國侵略的同盟者。……在美國控制下的各國人民無法容忍，便要起來擺脫美國的控制」。為此他反覆強調，要注意中間地帶的重要性問題，在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的修改和批語中明確指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數幾個國家的廣大的後方。失掉了這個後方，帝國主義就將崩潰。現在這個後方

的廣大部分已經解放了，還有幾個部分正在爭取解放。」毛澤東還認為：「帝國主義已經為這三個洲的國家造就了強大的無產階級，帝國主義也在這些國家造就了知識份子隊伍。帝國主義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階級，造就了知識份子，結果將是由它造就出來的人把它自己推翻。」^⑤

最後，毛澤東強調民族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支援。他指出，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意識到同蘇聯和中國打仗不可能取勝，這就是為甚麼越來越激烈地爭奪兩個鬥爭力量之間的中間國家。在這些中間地帶上，美國正在建立自己的軍事基地，在政治和經濟上奴役這些國家，把它們變成半殖民地，變成自己的附庸。但是這些國家的人民不希望戰爭，他們明白，對於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國家來說，戰爭意味着整個毀滅。所以這些人民努力對抗美國的侵略政策，努力擺脫它的控制。爭取中間地帶的國家，對於力量對比使之有利於社會主義陣營具有重要意義^⑥。為此毛澤東明確中國的外交方針：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鬥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我們就要支持」。毛澤東還強調，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最主要的力量」^⑦。

導致50年代後期中國外交戰略發生重大變化的因素，不僅有前述的國際原因，而且還有國內的重要因素，即國家經濟建設上的「大躍進」。大躍進不僅是這一時期中國重要的經濟現象，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決策，是毛澤東試圖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狀況，改變同西方國家力量對比的重要行動。因此，大躍進的思想基礎，同50年代後期中國「革命外交」的指導思想是一致和相互補充的。

大躍進的根本目的不僅要在經濟上趕上蘇聯，而且要盡快超過英美。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再次批判經濟建設中反冒進的問題，正式提出大躍進的方針，確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要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七年趕過英國，十五年趕過美國」的新口號。隨後，在反冒進和大躍進的氣氛下，經濟建設計劃不斷被修改，1958年6月毛澤東明確要求：「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只要1962年達到6,000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兩個多月後，毛澤東甚至提出了「七年超過美國，變成天下第一」。

大躍進的狂熱對中國外交產生了深遠影響，毛澤東要求外交工作必須克服保守思想，破除對西方的迷信。1958年6月，外交部召開討論國際形勢的務虛會，這次會議雖然肯定1949年以來的外交路線是正確的，但也指出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右傾保守偏向，包括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上忽視必要的批評，對一些修正主義的觀點不加批駁；在同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上，忽視必要的鬥爭，模糊了社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界線；在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上，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毛澤東特別強調，1954年指示在日內瓦會議上同美國人接觸，這與自己一貫的想法不一致，看來還是原來的想法好，即堅持和美國鬥爭，不和美國發展關係。這次會議把中國的外交政策歸納為：「搞臭南斯拉夫，鞏固社會主義；打擊美國，搞垮帝國主義；孤立日本，爭取民族主義。」

重提中間地帶理論並賦予新的內涵以及「不斷革命」理論的提出，標誌着50年代後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出現了革命外交的重要特徵。它要求中國支持

重提中間地帶理論並賦予新的內涵以及提出「不斷革命」理論，標誌着50年代後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出現了革命外交的重要特徵。它要求中國支持世界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這同赫魯曉夫的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總路線、特別是「三和路線」、與美國搞緩和有根本分歧。

世界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這同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 的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總路線特別是「三和路線」、與美國搞緩和有根本分歧。

二 中蘇戰略分歧與炮擊金門的決策

進入50年代中後期，中蘇兩國關係開始發生明顯變化；除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反對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外，兩國也在一些重大戰略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領導人在國際形勢上考慮或應付的現實問題多，缺乏對於整個局勢的全面分析和預見；「考慮和討論世界戰略和遠景問題很差」。

中間地帶理論的系統化以及由想像中的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增強，直接導致毛澤東提出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論斷。根據自己對國際戰略力量對比的判斷，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明確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在他提出的十點證明「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據中，其中有八點都可以說是體現了毛澤東的中間地帶理論，主要包括：中國革命、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蘇伊士運河事件、敘利亞、英國退出亞洲和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蘭退出印尼以及法國退出敘利亞、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爾及利亞沒有辦法等。因此毛澤東的結論是，「西方國家拋到後邊了，我們大大佔了上風了」^⑥。

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明確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在此論斷下，中蘇在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總路線的問題上產生了根本分歧，簡單的說，就在於要不要把支持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作為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總路線的其中一個內容。

在「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下，中國和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總路線的問題上產生了根本分歧，首先體現在如何對待「和平共處」的政策。和平共處是蘇共二十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中共自從1954年以來也高度評價和平共處原則，但隨着中間地帶理論的提出和對國際形勢有了新判斷，中國領導人開始認為，「亞非國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們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和它們建立統一戰線的基礎」。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這個統一戰線是反帝、反殖的統一戰線，決不是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進行所謂的「和平共處」。中國領導人特別強調：赫魯曉夫和蘇聯其他領導人對和平共處政策的定義是有限的概念，因為和平共處政策的全部內容不僅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支持世界革命、聲援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執政的共產黨的問題，而且還包括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支持的問題，還有支持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⑦。因此，在八大二次會議的決議中，中共對和平共處這個前幾年還在宣傳上大加讚揚並在實踐中運用的重要原則幾乎沒有提及，顯示中共領導人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變化。中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外交總路線的看法同蘇聯的根本分歧之一，就在於要不要把支持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作為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總路線的其中一個內容。

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將和平共處確定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他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思想，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這不是權宜之計的策略，而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針對中國的論點，蘇聯領導人認為，不能有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國家合作以及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三條總路線。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地位和作用，兩國領導人進行過激烈的辯論，並成為中蘇論戰的重要內容。蘇聯領導人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總路線只有一條，根據這條總路線才有了支

持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世界和平和社會主義鬥爭的其他一切措施；這是因為蘇聯「把和平共處看成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是以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合作和相互援助為出發點的，而不僅僅是支持民族解放運動」^⑩。

毛澤東在炮擊金門後反覆說明，炮擊的目的首先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帝鬥爭。他在炮擊開始當天晚上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着重指出，這次炮擊金門，「老實說是我們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採取的行動，就是要整美國人一下。美國欺負我們多年，有機會為甚麼不整它一下」。國防部長彭德懷在軍委會議上傳達毛澤東和中央決定時也強調，最近美英兩國軍隊武裝干涉黎巴嫩和約旦，企圖鎮壓黎、約人民及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中國人民的支持要有實際行動。這個行動一是空軍進入福建，二是對金門打炮。……同時告訴全世界人民，美帝國主義要打仗，中國人民是不怕的。因此，炮擊金門突出體現了中國「革命外交」中大力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

中國同蘇聯在外交政策上的另外一個重要分歧則在於，要不要同美國進行緩和。根據和平共處總路線，赫魯曉夫把改善同美國的關係放在蘇聯外交政策的首位。為此，赫魯曉夫積極採取措施，極力推崇大國外交，積極推進首腦會晤。而這些恰恰是中國所堅決反對的。除前述理論上的原因外，一個非常突出的現實問題是：讓中國同美國進行緩和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依然佔領着台灣，繼續支持自己的敵手國民黨。對此，毛澤東在1958年7月底8月初同赫魯曉夫的會談中就明確指出：「你不必搞甚麼聯合艦隊，你只要收回28日的建議，不跟美國開甚麼最高會議，這比聯合艦隊更能對付美國人。我們堅決反對和那些仍然支持台灣的美帝國主義搞甚麼最高級會議。」毛澤東還進一步強調：「台灣是靠美帝國主義支持，對待美帝國主義的態度如何，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原則問題。」因此在毛澤東看來，炮擊金門是對蘇聯緩和政策的最好回答。

同時，「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直接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誰怕誰」的問題，這實際上涉及到如何估計美國的實力。毛澤東曾經問葛羅米柯 (Andrei A. Gromyko)：「美國在經濟上當真就那麼強大，以至同他們鬥爭都很困難嗎？」但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答案無疑是：「是杜勒斯怕我們怕得多一點，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國家怕我們怕得多一點。為甚麼他們怕的多一點呢？就是一個力量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人心就是力量，我們這邊的人多一點，他們那邊的人少一點。」由此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世界處於被動地位，迫使它進行防禦，國際形勢對社會主義陣營完全是有利的，因為「在我們一邊集中了亞非和其他國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出現了我們的擁護者。

而蘇聯領導人則認為，在分析美國的實力及其經濟潛力時，應該考慮的是，美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業設備，目前具有較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同時擁有龐大軍隊和先進武器，不能簡單地視之為「紙老虎」；對於中國認為可以提昇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大躍進運動，蘇聯方面基本持反對意見，並認為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毒草」。赫魯曉夫直接告訴毛澤東，蘇聯不能理解中國的大躍進，他們認為有超越階段、忽視規律的情況。蘇聯觀點的含義非常明確：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可以不怕美國等西方國家，但社會主義陣營包括蘇聯在內的

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當天晚上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着重指出，這次炮擊「老實說是我們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採取的行動，就是要整美國人一下」。因此，炮擊金門突出體現了中國「革命外交」中大力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也是對蘇聯緩和政策的最好回答。

國家要具備美國那樣的經濟實力尚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對中國炮擊金門的行動，赫魯曉夫後來指責「不要以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充分體現了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同中國的分歧。

蘇聯認為，反對和平共處，堅持同帝國主義鬥爭，勢必會造成國際局勢緊張，不利於世界局勢的緩和與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實行，從根本上不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而中國的觀點則截然相反。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緊張局勢「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他後來一直堅持認為：「國際緊張局勢到底對誰利益大，對美、英利益大或者對我們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大，這還是一個問題。美國逐步看到國際緊張對它不利了。因為緊張的局勢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動員全世界人民，動員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能多增加幾個共產黨人。」毛澤東還認為，與美國進行鬥爭可以破除人民對美國的迷信。他反覆強調：在我們這裏，過去親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別是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也有許多勞動群眾，他們不喜歡美國人，但是怕美國人。要做艱苦細緻的工作，幫助他們逐漸消除這種恐懼心理。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炮擊金門，製造緊張局勢，也是要達到這個目的。

炮擊金門的決策還體現了50年代中後期中蘇兩國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以及在國家軍事戰略的差異。中國軍事戰略思想在50年代中後期開始實行積極防禦戰略，強調「人民戰爭」的作用，同時改變在軍隊建設中一切照搬蘇聯經驗的做法。這種思想在軍隊中形成了要敢於「打爛仗」的說法，強調「要準備打到一架飛機、一輛汽車也沒有……思想上一定要準備打爛仗。爭取爛一半，不準備打爛仗，就沒有勇氣，就不敢打」。

炮擊金門的決策還體現了50年代中後期中蘇兩國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以及在國家軍事戰略的差異。中國軍事戰略思想在50年代中後期開始實行積極防禦戰略，強調「人民戰爭」的作用，同時改變在軍隊建設中一切照搬蘇聯經驗的做法。1956年3月彭德懷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主題報告，明確提出「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這種戰略思想，在當時是以美國為主要作戰對象、敵軍的大規模進攻來自海上為背景的。因為在戰爭初期「企圖完全把敵人殲滅於海上和灘頭，根本不讓敵軍侵入我國領土，這種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據敵我軍事力量對比情況，不但做起來有很大困難，而且也是很危險的」。為此，毛澤東指出，即使沿海地區被佔領了，還有大西北、四川和國家其他地區。「即使出現這種不可能的情況，我們還有廣大後方可以繼續開展鬥爭。現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滅蘇聯和中國遼闊的領土和眾多的居民……中國的歷史已多次證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滅，也絕不意味着民族的消滅」^①。這種思想到50年代後期在軍隊中形成了要敢於「打爛仗」的思想，強調「要準備打到一架飛機、一輛汽車也沒有……思想上一定要準備打爛仗。爭取爛一半，不準備打爛仗，就沒有勇氣，就不敢打」^②。

更為重要的是，積極防禦戰略還體現了這一時期中國革命外交的特點。1958年7月22日通過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對於進犯我國領土、破壞遠東和世界和平的敵人，除了必須在防禦階段加以擊敗以外，還必須適時地轉入反攻和追擊，一直到把侵略者趕回它的本土，堅決、乾淨、全部消滅之，解放那裏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永遠不再發生。」

蘇聯的軍事戰略從50年代中後期也開始變化，其特點是從「加強積極防禦，防止敵人侵略」的戰略方針，轉變為火箭核戰略，強調核武器的首次突擊作用，認為現代戰爭在幾分鐘內就可以結束，因此奉行先發制人的戰略方針。這種戰略方針的轉變同蘇共二十大以來蘇聯對戰爭的看法的重大變化密切相關。蘇聯領導人強調核武器的出現改變了以往的戰爭概念，戰爭已不是政治的繼續，戰

中國軍事戰略思想在50年代中後期開始實行積極防禦戰略，強調「人民戰爭」的作用，同時改變在軍隊建設中一切照搬蘇聯經驗的做法。這種思想在軍隊中形成了要敢於「打爛仗」的說法，強調「要準備打到一架飛機、一輛汽車也沒有……思想上一定要準備打爛仗。爭取爛一半，不準備打爛仗，就沒有勇氣，就不敢打」。

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的區別不大了。同時蘇聯還認為，在一場核戰爭中沒有絕對的勝利者。在這種背景下，蘇聯主張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爭端和意見分歧，不要企圖用強力改變現狀，反對任何可能導致相互毀滅的戰爭。

蘇聯的戰略方針同中國的「不怕核戰爭，準備打爛仗」的思想有根本區別。毛澤東後來講，在金門事件的過程中，中美雙方都在搞邊緣政策；美國人在這個戰爭邊緣，我們在另一個戰爭邊緣，我們是以戰爭邊緣政策對付美國的戰爭邊緣政策。毛澤東還用《聊齋志異》中「狂生夜讀」的故事來表明中國對待戰爭的觀點。毛澤東說，《聊齋志異》的作者告訴我們，不要怕鬼，你越怕鬼就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毛澤東說的這個「鬼」，指的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和它們企圖發動的戰爭。

三 蘇聯對炮擊金門的反應及其政策選擇

蘇聯領導人對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的爆發並不感到吃驚。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領導人說，他們事先準備採取「針對蔣介石的一次新的軍事行動，他們要求空中掩護以及射程遠的、部署在海岸上的炮群」^③。儘管如此，危機的爆發大大出乎赫魯曉夫意料之外，一則是中國沒有依照慣例向蘇聯通報炮擊的時間和計劃，其次赫魯曉夫也沒有料到美國對危機的反應會如此強烈。因此，危機使得蘇聯面臨非常嚴峻的兩難境地，以下重要因素影響蘇聯對危機的反應，制約着蘇聯的行為。

首先，最重要因素是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影響和制約。這個條約的第一條就明確規定：「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略，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顯然，一旦中國的行為使美國捲入軍事衝突，蘇聯勢必要對中國履行條約義務，這樣將使蘇聯捲入一場同美國的戰爭，甚至是核戰爭。因為早在危機爆發之前，蘇聯軍界就開始探討美國在台灣海峽地區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蘇聯戰略家塔蘭斯基(N. Talensky)將軍在1958年1月的《國際問題》雜誌上撰文指出：通過對西方軍事戰略的研究可以判斷，台灣海峽是適合進行有限核戰爭的地區之一。因此，如何避免美蘇之間的戰爭，無疑是蘇聯在對危機作出反應以及採取相應行動時必須首先考慮的因素。

其次，同前一個因素相關，蘇聯必須考慮美國對危機的反應。中國炮擊金門後，美國政府反應強烈，一方面向台灣海峽地區增派軍力，調派航空母艦和一個中隊的B-47型轟炸機到遠東；另一方面，美國宣布將對金馬等沿海島嶼進行軍事干預。面對美國的強硬立場，蘇聯出於緩和同美國關係的戰略需求，一方面要盡量避免捲入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抗，另一方面，面對「長着核牙齒的紙老虎」，蘇聯還要表示對中國的支持，以維護其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威信和地位，但這種支持是有限度和謹慎的。正如《共產黨人》雜誌在一篇評論危機的文章中明確指出的，蘇聯對中國的支持不能冒發生戰爭風險的代價，文章甚至宣稱：「蘇聯不想要軍事衝突。」因此，赫魯曉夫在危機期間幾次表示對中國提供軍事上的支持，恐怕其考慮的出發點在於以此威懾美國，避免美蘇正面衝突。

蘇聯的戰略方針同中國的「不怕核戰爭，準備打爛仗」的思想有根本區別。毛澤東後來講，在金門事件中，中美雙方都在搞戰爭邊緣政策。毛澤東還用「狂生夜讀」的聊齋故事來表明，不要怕鬼，你越怕鬼就越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毛澤東說的這個「鬼」，指的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和它們企圖發動的戰爭。

蘇聯在危機中面臨兩難的政策選擇：一方面，蘇聯不得不公開支持中國的行動；另一方面，對中國的支持，可能會導致美蘇之間的戰爭，甚至是核戰爭。《共產黨人》雜誌文章甚至宣稱：「蘇聯不想要軍事衝突。」因此，赫魯曉夫在危機期間幾次表示對中國提供軍事上的支持，其出發點在於以此威懾美國，避免美蘇正面衝突。

第三，蘇聯在決策時清楚地意識到，她完全無法控制中國的行動。考慮到中國在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期間的行為，以及中國在處理波匈事件上的獨立性，蘇聯領導人明顯意識到，在處理第二次台海危機時應更多地考慮如何約束中國的行為，以避免中美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

同時，蘇聯決策者處理危機時必須考慮當時東西方戰略力量的對比。一方面，蘇聯雖然認為東西方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變化，但要完全有利於社會主義陣營，恐怕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這同中國的判斷有着根本的分歧；另一方面，同這一時期蘇聯對其他危機的反應、特別是對柏林危機的反應明顯不同的是，蘇聯在台海地區缺乏軍事優勢，蘇聯軍方在危機爆發之前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使得其對危機的反應更加謹慎。

最後是蘇聯對沿海島嶼本身重要性的考慮。毫無疑問，蘇聯的戰略重點是在歐洲，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同美國爭奪的重點同樣是在歐洲。至於沿海島嶼的地位，蘇聯顯然認為缺乏同美國進行全面戰爭的重要性，不值得為這些小島同美國爆發戰爭。但蘇聯領導人沒有意識到，這些島嶼對中國來講，卻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標誌。

以上分析的重要因素導致蘇聯在危機中面臨兩難的政策選擇：一方面，出於維護自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信譽和威望，蘇聯不得不公開支持中國的行動；另一方面，對中國的支持，可能會導致美蘇之間的戰爭，甚至是核戰爭。因此，蘇聯在危機期間的政策選擇，依據對中國危機決策的了解和認識以及美國對危機的反應，大致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在整個危機過程中，蘇聯的反應與決策是被動和謹慎的。

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從炮擊開始到1958年9月底），中國炮擊金門的一個主要目的，從軍事上來講，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對沿海島嶼則是相機行事，機會來了就佔領金馬。由於蘇聯不了解中國炮擊金門的戰略意圖和作戰目的，因此在危機的第一階段，蘇聯一方面發表聲明支持中國的行動，並試圖採取相應的具體措施；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途徑了解中國的意圖和目的，以期影響和制約中國的行為。由於意識到在台海地區可能爆發戰爭，蘇聯軍方在這一階段的反應更為謹慎和克制。

儘管蘇聯可能事先知道中國將要採取的行動，但令蘇聯領導人震驚的是，中國方面完全沒有告知炮擊的時間、行動方針以及具體目的。了解中國的行動意圖，成為蘇聯進行決策的前提，蘇聯駐華使館成為相關情報的重要來源。得知中國炮擊金門後，蘇聯使館立即電告蘇共中央，中國只是在8月23日發動炮擊後才告訴我們，之前絲毫沒有透露這一本已在計劃中的重大軍事政治行動的意圖。赫魯曉夫收到蘇聯使館的通報後，立即要求蘇聯大使轉告中方，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才剛剛開始，經濟上和軍事上還比較落後，目前不具備打現代化戰爭，也不具備對台灣實施登陸作戰的條件。包括蘇聯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也沒有必要現在捲入這場戰爭之中。由於以上所分析的原因，毛澤東通過外交部通知蘇聯方面說，這些島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我們如何解放它們，是我們的內部事務^④。

從危機開始到1958年底，蘇聯大使館共向國內發回52份有關報告，他們對中國政策的基本判斷是：中國同志利用毛澤東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

紙老虎」的論斷，認為在危機中「可以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並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但蘇聯大使館的報告卻認為，「僅僅把解決台灣問題視為純屬中國內政完全是錯誤的。我們的中國朋友在台灣衝突發展的第一階段，採取了極為簡單的方法去評估台灣問題的緊迫性，從而導致惡化國際緊張這種可能性的出現，使得美國方面採取戰爭邊緣政策」。蘇聯大使館的報告還明確指出：「中國人現在表現出來的傾向是要自己解決亞洲問題，他們並不認為有必要與我們商量他們計劃中的行動，儘管當局勢失控的時候他們會指望我們的支持。」^⑮

由於無從確切了解中國行動計劃的意圖，蘇聯方面決定派葛羅米柯到中國。在此之前，蘇聯駐華使館參贊蘇達利柯夫 (N. G. Sudarikov) 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在9月5日拜會周恩來。蘇達利柯夫告訴周恩來：「葛羅米柯同志此次訪問北京的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報赫魯曉夫同志就台灣海峽的事態給艾森豪威爾的信件」，同時與中國「交換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周恩來利用這次會談，從國際和國內兩方面談了中國對台灣海峽形勢的分析、美台矛盾以及中國的立場、策略和所採取的行動。周恩來特別強調：「中國炮擊金門、馬祖並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灣，只是要懲罰國民黨部隊，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如果打出亂子，中國自己承擔後果，不拖蘇聯下水。」^⑯

9月6日，周恩來同葛羅米柯會晤，向他說明中國政府在台灣海峽地區等問題上的立場，葛羅米柯表示蘇共中央完全贊同中方的立場和措施。根據蘇聯的檔案紀錄，周恩來在會晤時對葛羅米柯說：由於對沿海島嶼實施打擊，中國已經考慮到有可能在這一地區爆發美國針對中國的局部戰爭，準備承受嚴重的打擊，包括原子彈和城市的毀滅。周恩來指出，即便是美國使用了戰術核武器，蘇聯也不需在戰爭的這一時期參戰。只有當美國使用較大能量的核武器，並以此方式冒擴大戰爭風險的時候，蘇聯才應當用核武器對美國實施反擊^⑰。根據葛羅米柯的回憶錄，毛澤東在同葛羅米柯的會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赫魯曉夫在同中國進行磋商之後，針對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的核威脅政策和新港聲明，在9月7日發出了致艾森豪威爾 (Dwight D. Eisenhower) 的公開信，呼籲美國政府對台灣及台海地區所採取的行動要謹慎從事，不要輕易採取可能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的步驟。信中指出，對中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蘇聯也嚇不倒中國，那些策劃對中國進行原子進攻計劃的人不應忘記，不只是美國，另一方也擁有原子武器和氫武器以及發射這些武器的相應工具。如果美國對中國發動這種進攻，那麼，它立即會受到應得的同類武器的反擊。信中特別強調：「對我們偉大的朋友、盟邦和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也就是對蘇聯的侵犯。」葛羅米柯在9月18日聯大會議發言中重申了赫魯曉夫的聲明。赫魯曉夫在9月19日致艾森豪威爾的第二封信中再次表達了上述立場。

與此同時，赫魯曉夫還特地召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進行一次「重要談話」。在這次會談中，赫魯曉夫明確闡述了蘇聯對危機的立場態度，表露出對爆發戰爭的擔憂。赫魯曉夫說，美國的戰爭邊緣政策很危險，要特別提高警惕。為了防止局勢進一步發展，蘇聯將考慮採取一些具體步驟，幫助中國制止美蔣侵略陰謀的實現。因此，蘇共中央經過討論研究後認為，應在空軍方面加強那一地區的力量，使這裏的力量能夠對美蔣海軍起到威懾作用。赫魯曉夫的真實意圖是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建立平衡美國優勢的力量，以期避免美蘇對抗。中共中

根據蘇聯的檔案紀錄，周恩來在與葛羅米柯會晤時說：即便是美國使用了戰術核武器，蘇聯也不需在戰爭的這一時期參戰。只有當美國使用較大能量的核武器，並以此方式冒擴大戰爭風險的時候，蘇聯才應當用核武器對美國實施反擊。周恩來特別強調：「如果打出亂子，中國自己承擔後果，不拖蘇聯下水。」

赫魯曉夫曾召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進行「重要談話」，明確表露對爆發戰爭的擔憂，蘇聯將採取一些具體步驟，幫助中國制止美蔣侵略陰謀的實現。赫魯曉夫的真實意圖是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建立平衡美國優勢的力量，以期避免美蘇對抗。中共中央經過討論後婉言謝絕蘇聯的建議。這使蘇聯領導人感到更為難堪和極為不滿。

央考慮到前一階段出現的「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事件，經過討論後婉言謝絕蘇聯的建議。

中國的這一立場使蘇聯領導人感到更為難堪和極為不滿。9月27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再次強調蘇聯政府的立場，強調中蘇團結與聯合的重要性，強調對中國的進攻就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進攻，就是對蘇聯的進攻。但信件同樣強烈地表明蘇聯領導人對中國行為的不滿。信件指出：「我們不能允許敵人有這樣的幻想，即如果美國或日本或其他任何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進攻，蘇聯將袖手旁觀。」信件情緒激烈地說：「如果當原子彈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當中國的兒女們已經付出生命代價的時候，而蘇聯，不僅擁有可以阻止我們敵人而且還可以摧毀敵人的可怕武器，卻允許自己不向你們提供援助，這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國際工人階級運動，都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是對世界工人階級的犯罪，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教導的共產主義最神聖的原則的背叛」^⑩。

蘇共中央的這封信清楚表明蘇聯在危機中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如果蘇聯履行同盟義務，則中國的行為使蘇聯有捲入戰爭甚至是核戰爭的危險；另一方面，如果蘇聯袖手旁觀，則中國的行為使得蘇聯可能在社會主義陣營面前喪失信譽和威望。為此，赫魯曉夫又連續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表示蘇聯可以派攜帶地空導彈的C-75型轟炸機到福建，增強中國的防空力量，改變台海地區的戰略力量對比，避免戰爭。毛澤東覆信給赫魯曉夫雖然表示歡迎，但他強調，「為了最後勝利，我們願意承擔第一個打擊，滅掉帝國主義，無非是死一大堆人」。毛澤東同時提議，最好請蘇聯政府供應一批地空導彈和岸艦導彈，並派來技術人員幫助中國訓練使用這些武器的部隊。中共中央的態度不僅表明中國自己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也反映出中共領導人繼續反對蘇聯在軍事上控制中國的「企圖」。

與蘇聯政治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和赫魯曉夫支持中國的聲明相比，蘇聯軍方在危機期間異常沉默。這種沉默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蘇聯軍方報刊對危機的報導持異常冷淡的態度。危機爆發後，《真理報》連續發表三篇「觀察家」的文章，支持中國的行動；這些文章都警告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就是對蘇聯的「威脅」，蘇聯將提供一切必要的「道義和物資上的援助」。而蘇聯軍方報刊基本上沒有發表任何文章。特別突出地反映蘇聯軍方態度的是在赫魯曉夫兩次致函艾森豪威爾之後。蘇聯政治報刊都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加以報導，並配以社論表示支持。但蘇聯軍方報刊卻降低調門，反應冷淡，或不發表評論，或根本不提及赫魯曉夫聲明中的核心部分。赫魯曉夫致艾森豪威爾的第二封信公布後，蘇聯軍方報刊的反應更為冷淡，軍方各主要報刊基本上未對赫魯曉夫的聲明作任何評論。

另一方面，同其他危機相比，蘇軍高級將領完全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場，只有負責蘇軍裝甲部隊的魯特米斯托夫 (P. A. Rotmistrov) 元帥在9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簡略地提到蘇聯武裝力量正「警惕」地注視着遠東的局勢，但隻字未提蘇聯對中國的支持。最為突出的是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 (Rodion Malinovsky) 元帥和華約司令科涅夫 (Ivan Konev) 元帥的表現。在危機的高潮時刻，馬利諾夫斯基在莫斯科軍事工程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明顯迴避發表自己對危機

的觀點。作為7月底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時蘇聯代表團的成員，馬利諾夫斯基的態度是反常的。與此同時，科涅夫在波蘭建軍節的慶祝會上，對台海危機也是避而不談。

蘇聯軍方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蘇聯決策層對蘇聯採取何種政策的意見分歧，但目前尚缺乏蘇聯的檔案文獻來證實這種分歧的真實性及其意義。也許可以這樣理解蘇聯決策過程中出現的這種分歧：它僅僅是一種表面現象，其實質是蘇聯擺脫兩難境地的一種策略手段，通過赫魯曉夫的聲明表示蘇聯履行條約義務的決心，維護其信譽；而軍方表現的目的則在於向美國和中國顯示蘇聯對危機反應的克制與謹慎。因此，從決策過程看，這種表面上的不協調並沒有從根本上影響赫魯曉夫的危機決策。

在危機的第二階段，中國改變了對沿海島嶼的政策。毛澤東考慮到這一階段美國的政策，在9月底認為佔領金門的意見「恐怕不宜採納」。經過研究，中共中央決定將金馬留在國民黨手中，將來一攬子解決台灣問題。周恩來遂在10月5日和14日向蘇聯代辦安東諾夫(S. F. Antonov)通報了中國對台灣海峽的政策。赫魯曉夫表示同意中國的政策。目前尚無蘇聯方面的檔案文獻詳盡論述蘇聯在危機第二階段的決策過程，但有兩點是非常清楚的：首先，赫魯曉夫繼續在各種場合對中國的行為表示支持；其次，赫魯曉夫非常不滿這一階段中國的新政策，這一點在1959年中蘇會談中暴露得特別明顯。赫魯曉夫稱中國對沿海島嶼的處理是「托洛茨基式的」。

在危機的第二階段，毛澤東在9月底認為佔領金門的意見「恐怕不宜採納」，中共中央決定將金馬留在國民黨手中，將來一攬子解決台灣問題。蘇聯方面有兩點是非常清楚的：首先，赫魯曉夫繼續在各種場合對中國的行為表示支持；其次，他又非常不滿這一階段中國的新政策，稱中國對沿海島嶼的處理是「托洛茨基式的」。

四 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儘管還需要更多的檔案文獻來釐清危機期間中蘇關係的演進，但這次危機無疑嚴重損害了中蘇同盟。首先，危機為雙方關係的發展投下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陰影。蘇聯認為中國炮擊金門不僅違反了條約，使蘇聯陷於嚴重的戰爭風險；更為重要的是，蘇聯認為中國的行為破壞了蘇聯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有損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輿論面前的威信。這就是赫魯曉夫對中國採取如此重大的行動竟然事先不通知他而一直耿耿於懷的原因。在蘇聯領導人看來，中國炮擊金門「實際上正好迎合了美國好戰集團破壞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方針的意圖。北京打算借助這種行動來激化蘇美關係，並利用蘇中條約這部機器把衝突擴大為遠東的軍事對抗」。

由於炮擊金門具有「針對這一時期赫魯曉夫上台後對西方的姑息政策」這一決策背景，因此，在毛澤東的眼裏，赫魯曉夫同美國搞緩和，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還算甚麼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實際上，早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印發了《馬列論不斷革命的語錄》，在內部開始批評蘇共中央。對於蘇聯對中國行為的責難，毛澤東在1959年的一次內部講話中作了極為深入的總結，他強調指出：「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到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對中國極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他怕東歐的各黨和世界各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而相信我們。」因此，

赫魯曉夫1959年10月訪問北京時埋怨炮擊金門給蘇聯「造成了困難」，他的建議和遭到中共領導人的拒絕和嚴厲批駁。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告訴赫魯曉夫：如何解放台灣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你是無能為力的，不宜說三道四。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國犧牲其主權和領土完整。

由炮擊金門所揭示的中蘇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分歧，使得中蘇關係的公開破裂，僅僅是時間問題了。

其次，危機加深了雙方在台灣問題以及在沿海島嶼問題上的矛盾和分歧。蘇聯雖然在危機期間表面上支持中國，但實質上是反對中國對台灣問題以及對沿海島嶼的政策立場，這種態度在赫魯曉夫1959年10月訪問北京時同中共領導人的會談中得以充分體現。赫魯曉夫不但埋怨1958年炮擊金門給蘇聯「造成了困難」，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表示不滿，而且明確告訴中國領導人，一旦台灣海峽爆發戰爭，蘇聯是不會捲入的。赫魯曉夫還建議今後中蘇通過一定途徑就台灣問題交換意見，了解彼此的立場和方針、政策。赫魯曉夫的建議和觀點遭到中共領導人的拒絕和嚴厲批駁。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告訴赫魯曉夫：如何解放台灣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你是無能為力的，不宜說三道四。因此，中國領導人認為，從蘇聯領導人對中國炮擊金門所作出的反應可以清楚地看出：蘇聯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國犧牲其主權和領土完整。

第三，炮擊金門產生的另一重要後果是，促使蘇聯領導人停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赫魯曉夫在危機中已經決定，蘇聯將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並要重新考慮與中國的關係。對此，一心要同美國搞緩和、感到無法約束中國行為的赫魯曉夫認為，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是非常危險的。因此，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結束不到一年，1959年6月20日蘇聯正式通知中國，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材料。

中共中央認為蘇聯此舉是中蘇關係中一起重大事件。由於此時蘇聯在核禁試問題上追求與美國的合作，單方面宣布停止一切核試驗。對此中國領導人認為，依照赫魯曉夫的邏輯，既然要停止核試驗，那當然不能讓中國製造原子彈；這就表明赫魯曉夫這時傾向於同西方搞妥協，認為這樣就可以維護世界和平。中國領導人相信，赫魯曉夫把和平的希望寄託在同美國達成協議上，而不是依靠進一步增強社會主義陣營力量（包括中國擁有原子彈）、依靠社會主義陣營、世界民族獨立運動、世界工人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力量的聯合鬥爭。對此中共中央的結論是：蘇聯的這個行為說明赫魯曉夫可能要在中蘇關係上採取新的方針，因為他在1958年提出要在中國建長波電台、搞聯合艦隊，實際上是要控制中國；當這些遭到抵抗後，他可能採取新的方針——同西方主要是美國站在一起反對中國^⑩。蘇聯的行為後來被中共抨擊為「聯美反華」。

這樣，赫魯曉夫在1958年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中決定停止向中國提供核工業技術援助，實際上是中蘇分裂進程中一個重要方面——核政策上的控制與反控制鬥爭的緣起，其影響是深遠的。

五 結 論

1958年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是中蘇關係走向破裂進程中的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與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同時更為重要的是，1958年第

二次台灣海峽危機清楚表明，中蘇兩國的矛盾和分歧開始由意識形態領域向國家關係特別是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成為中蘇矛盾和分歧公開化以及國家關係迅速惡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註釋

- ①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1.
- ②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16-17。
-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159-60；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1958年1-12月)，頁393。
- ④ 毛澤東：〈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1958年1-12月)，頁370-71；同註③毛澤東，頁384。
- ⑤ 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7。
- ⑥ 1956年5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Pavel F. Yudin)與毛澤東的會談紀錄，俄國檔案，SD08102，此為沈志華收藏的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編號，下同。
- ⑦ 毛澤東：〈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8。
- ⑧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1956年1月至1957年12月)，頁630-37。
- ⑨⑩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年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51-53；207-208。
- ⑪ 1960年11月26日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的會談紀錄，俄國檔案，SD09880。
- ⑫ 1956年5月2日尤金與毛澤東的會談紀錄，俄國檔案，SD08102。
- ⑬ 1958年7月24日中央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參見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318。
- ⑭ “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 *Voprosi istorii*, 1993, no. 2；參見註⑩書，頁220。
- ⑮ TsKhSD (Stora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Documents of Russia), f.5, op.49, d.239; f.5, op.49, d.131; f.5, op.49, d.134。參見註⑩書，頁221-24。
- ⑯ TsKhSD, f.5, op.49, d.134。參見註⑩書，頁223。
- ⑰ 1958年9月5日蘇達利柯夫同周恩來總理的會談紀錄，TsKhSD, f.5, op.49, d.134。參見註⑩書，頁224-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66。
- 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卷，頁166。1958年9月6日葛羅米柯同周恩來總理的會談紀錄，TsKhSD, f.5, op.49, d.133。參見註⑩書，頁225。
- ⑲ 蘇共中央1958年9月27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件，參見“Khrushchev's Nuclear Promise to Beijing During the 1958 Cri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26-27。

戴超武 東北師範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現任南京國際關係學院教授。